

【史海钩沉】

□郑学富

冷枚(1669年—1742年),字吉臣,号金门画史,山东胶州人,清代宫廷画家。冷枚的祖先是元末著名画家冷起岩,由于他为元顺帝画肖像有功,元顺帝赏给他胶州黄埠岭土地若干顷,于是后人世代在此居住。

冷枚师承清初宫廷画家焦秉贞,颇得师传,并能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画作吸收了西洋画法,工笔中带有写意,笔极精细,亦生动有致,古人曾以“工丹青,妙设色,画人物尤为一时冠”来评价他的画作。

康熙二十七左右,在老师焦秉贞的介绍下,冷枚进入宫廷,受到康熙赏识。在康熙五十年左右,他已成为内廷画院的领班人物。

有一年中秋节将至,康熙

皇帝下旨令冷枚绘制一幅玉兔之作,这是因为玉兔在古时被称为瑞兔,是祥瑞之兆。冷枚接到任务后,只用几天时间便完成了一幅《梧桐双兔图》,康熙看后大为赞赏,赞道:“兔为明月之灵,世间能绘玉兔祥瑞,灵气者唯冷枚也。”

《梧桐双兔图》,绢本设色,纵176.2厘米、横95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图是一幅中秋节题材的画作,图中梧桐挺拔、桂花飘香,梧桐叶绿中泛黄,使人感觉到秋风萧瑟,亦可看出冷枚观察生活细致入微。

梧桐是秋天的象征,又寓意高洁美好的品格。《诗经·大雅·卷阿》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在《梧桐双兔图》中,梧桐树下,两只白兔正在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耍,双兔工笔写实,造型准确生动,细腻的白兔绒毛被逐根勾勒出来,几块山石点缀得恰到好处,于坚硬中见峻峭之美。整幅作品构图疏密有致,冷暖色调对比融洽,尽管表现的是仲秋时节的景致,却让人感到节日的融融暖意。

在清康熙年间,冷枚还画了一幅《赏月图》。中秋赏月是中国流传几千年的传统习俗。《晋书》记载,早在晋代就有中秋泛江赏月之俗,中秋赏月繁盛于唐代,并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使中秋文化充满瑰丽多姿的色彩和浪漫迷人的魅力。《赏月图》描绘了一位文人静坐独赏明月的场景,展现出一种别致的情趣,描绘了寂寥、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

《赏月图》,纵119.8厘米、横61.2厘米,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文士头戴乌纱帽,身穿紫色朝服,怀中放着一柄如意,正坐在桂花树下,仰望着天空中的明月,若有所思。一童子站立在他的

身旁,手中捧着一个白瓷盖碗,白瓷盖碗与天上一轮皎月相得益彰,更趁出赏月之人的玉壶冰心;另一童子手执饰有双凤纹的障扇,立于身后。在《赏月图》中,文士身后的桂花树高大挺拔、树叶葱绿,桂花盛开,仿佛可以闻到一阵阵幽香,平添一份清凉之意,也使月光显得分外皎洁。画中明暗对比的表现手法,巧妙借鉴了西洋光影技法,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感。

冷枚在康熙时期受到重用,到了雍正时期却被冷落,还被逐出宫廷画院,乾隆慧眼识才,登基后又召冷枚招进宫中。乾隆很喜欢冷枚的《赏月图》,他令画师临摹此图,将画中的文士换成自己,并将画作取名《弘历赏月图》。画中,明月高悬、湖水清清,一棵桂树下,乾隆模仿士人装扮,怀抱如意,侧身跷腿,悠闲地坐在松木椅上,举头望向明月,脸上充满了兴致。身后一个童子手捧朱漆茶盘,上置青花盖碗,另一小童持扇而立,场面惬意、舒畅。因乾隆有喝茶的嗜好,画中旁侧的双层斑竹茶架中整齐摆放着茶具,有不同尺寸的茶罐、茶壶、茶碗、水盆和茶箱。乾隆帝对这幅仿品很满意,还饶有兴致地赋诗《弘历赏月图》。

冷枚在宫廷供奉了近半个世纪,有人称他为“以画供奉内廷最久”的清代画家。冷枚晚年在乾隆造办处内创作的作品与画稿有五六十件(套)以上,其题材非常广泛,有人物、佛道、鸟兽、马、建筑园林、宫廷器皿、历史故事等等。令人遗憾的是,冷枚当年在圆明园的众多精心创作都随着英法联军的抢掠和焚烧而化为灰烬。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枣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枣庄市首批社科智库专家)

故事里的沂蒙

“革命母亲”周大娘

在沂蒙红嫂中,曾经有这样一位女性,为了革命,忍痛将自己的女儿卖掉,换回20斤粮食给八路军当军粮。战士们发觉此事后,无不为之感动得落泪,纷纷凑钱将孩子赎回。她就是被战士们称为“革命母亲”的方兰亭。因夫家姓周,人们亲切地叫她“周大娘”。

方兰亭(1889年—1964年),山东兰陵县卞庄镇月庄村人,她的家乡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四县边联地区。方兰亭的丈夫周振苍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受其影响,方兰亭于1938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周振苍送情报时不幸被日军逮捕杀害。残忍的日本鬼子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村东门炮楼上,以此恐吓抗日群众。敌人的残暴并没有吓倒方兰亭,她强忍着巨大悲痛,毅然接下了地下交通员的工作。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查,她经常把情报藏在自己的发髻里,凭着灵活机智,一次次顺利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9年冬,边联县委在管流庄(今属费县新庄镇)召开群众抗战动员大会,遭到了国民党费县县长李长胜等人的武装镇压。李长胜下令国民党保安团对正在开会的抗日群众开枪射击,造成6名群众死亡,20多人受伤,自卫团300支枪被抢,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管流庄惨案”。惨案发生后,身为温河县妇救会长的方兰亭不顾年老体弱,冒着刺骨寒风,代表边联机关去各村慰问死难者家属。为了揭露国民党暴行,方兰亭还组织死难者家属去国民党112师师部请愿示威。那天她身穿孝衣,走在请愿队伍的最前面,到了112师师部驻地门前,她带着老老少少跪在雪地里,围住司令部呼号,寒风凛冽,哭声震天。112师师长霍守义开始还逃避,不见请愿群众,后来见事情闹大,怕不好收场,只好答应了抚恤死难者的要求。后来,因方兰亭组织请愿队伍、安排群众生活的事迹突出,鲁南区党委为她记特等功一次。

在边联县委整编当地土杂武装石邦杰部的过程中,方兰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石邦杰曾被日军追捕,逃入方兰亭家,是方兰亭救了他的性命。石邦杰拉起了抗日队伍,但是,跟着共产党八路军

还是跟着国民党,他心里没有主意。方兰亭主动向组织要求去做石邦杰的工作。方兰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石邦杰口服心服,最终率部300余人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940年,边联县内遭受灾荒。日伪军到处抢劫,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八路军不忍加重人民负担,都节衣缩食,吃糠咽菜,个个面黄肌瘦。当时,方兰亭的家里住着115师后方司令部的一个班。方兰亭一家与战士们相处得非常好,亲如一家人。看到战士们每次打仗回来,没有粮食只能吃糠,方兰亭心里非常难受。怎样才能让战士们吃饱,有力气打仗,这是她脑子里一直盘算的事情。可是,到哪里去弄粮食呢?孤儿寡母能有什么好办法呢?自从丈夫牺牲后,方兰亭拉扯着三个女儿生活。最小的女儿小兰才5岁。看着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战士,再看看自己的女儿,方兰亭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私下打听了一户人家,偷偷地把小兰卖给这户人家做童养媳,换回了20斤谷子。夜里她把谷子磨碎,掺点糠菜烙成煎饼。

第二天早晨,饥饿的战士捧着香喷喷的煎饼,边吃边问:“大娘,你从哪里弄来的粮食?”方兰亭笑着说:“大娘出去借的,下来谷子还他就是。”

过了一天,战士们忽然发现活泼可爱的小兰不见了。平时打仗回来,战士们总是喜欢哄小兰玩。正当战士们焦急纳闷时,首长李梓斌回来了,向战士们说出了真相。当战士们得知方兰亭为了能让他们吃饱饭竟然把自己的孩子卖掉的消息,心里都很不是滋味,纷纷哭着跪倒在方兰亭面前,泣不成声。战士们立即把兜里的钱全部拿出来,找人将小兰赎回来。李梓斌当即召开部队大会,高度赞扬了周大娘的爱军精神,他激动地说:“自古都说爱兵如子,周大娘可算是爱兵胜子。”从此,“爱兵胜子”的故事,在部队广泛流传开来。战士们觉得方兰亭比亲娘还亲,都称她是“革命母亲周大娘”。

解放战争中,方兰亭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军,荣立一等功。1948年,调费县实业科工作。同年底,方兰亭在淮海战役支前工作中立三等功。

胶州画家冷枚笔下的中秋



【齐鲁文物】

“孔庙三碑”的庙堂之气

□周惠斌

“孔庙三碑”是指位于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内的三块古碑,分别为“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它们是享誉中外的历史人文遗迹,被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汉隶圭臬”。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和碑”,刻立于东汉永初元年,无额,通高260厘米、宽128厘米、厚23厘米,共18行,满行40字。碑文记述了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将前鲁相乙瑛代孔子后人之言上书,奏请在孔庙设置掌管祭祀和礼器的专职官员“百石卒史”,汉桓帝准允,因乙瑛当时已去世,后以孔和补任。

“乙瑛碑”碑末刻有“后汉钟太尉(鍾繇)书,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但据稽考,所谓钟繇书丹乃后人伪托。“乙瑛碑”法度谨严、布局平实,横成行、竖成列,字距略大于行距,方整中有顿挫之势,平正中显秀逸之态。结体端庄匀适,字势开张、左右拓展、俯仰有致、向背分明。字形方圆兼顾,注重笔画的曲直平斜、粗细刚柔、轻重徐疾的

变化,讲究笔势的穿插避让、高低疏密的关系。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刻立于东汉永寿二年。碑无额,通高227.2厘米、宽102.4厘米,四面环刻文字。碑阳16行,满行36字,记述鲁相韩敕倡议修葺孔庙、增置礼器之盛事,碑末有韩敕等9人题名。碑阴3列,每列17行;左侧3列,每列4行;右侧4列,每列4行,皆刻捐资立石者的姓名和数额。

“礼器碑”行距紧凑、字距疏朗,结体上下精密,呈梯形状,左右伸展、横势宽绰、粗细有致,寓欹侧于平正中,寄疏秀在严密内。笔画以方为主,略带圆意;竖画外柔内刚,折画形断势连,撇画略取侧势,捺法圆润劲险。碑阳部分纵有序、横有列,字距宽、行距密;碑阴则纵有序、横无列,行距适度、字距参差。

“史晨碑”亦无额,通高231厘米、宽112厘米,厚22.5厘米,因是一石双面,两碑同刻,又名“史晨前后碑”。

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三月,有17行,每行36字(因每行末字掩埋于原石座中,旧拓多为35字),字径3.5

厘米,记载时任鲁相史晨和长史李谦祭祀孔子的奏章。

后碑全称“鲁相史晨脩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四月,有14行,每行35字至36字不等,记载祀孔和脩礼盛况,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4行。“史晨前后碑”迄今磨损极少,完整可诵,书风相类,笔致如出一人,传为蔡邕所书。

“史晨碑”碑文近千字,起笔露而能藏、尖而寓圆,其横笔取势平稳,竖笔劲挺稳健,斜向撇捺,极意伸展;左撇收缩,右捺舒展。结字扁平方正,呈方棱形;章法布局,横平竖直,纵横有列、井然有序,体现出儒家崇尚“中和为美”的审美情趣。

“孔庙三碑”作为汉代中后期隶书鼎盛时期的典范之作,久负盛名,唐宋以降,历代金石书家对它推崇倍至,清代金石学者翁方纲《所著两汉金石记》称“乙瑛碑”为“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孔庙三碑”对我国书法发展影响深远,是后人学习隶书的入门范本。唐代史惟则、梁升卿,清代郑簠等,皆喜临“乙瑛碑”。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员)